

热点透析

让节能减排产业“有利”可图

中国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协会会长王小康最近表示,2012年的主要节能减排目标有望完成,但这与经济增长有所放缓导致对能源需求有所降低有关,还不能代表节能减排的实质性成效。

点评: 推进节能减排面临复杂困难,但结构性因素是本质性因素。近年来,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行业结构、地区结构等结构性因素并未得到明显改变,甚至有向不利趋势发展的可能。在三大产业结构无法短期改变的条件下,要通过淘汰落后产能、推进产业升级来促进工业内部结构的优化,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努力加大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规模,推动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包括发展安全高效的核电,积极发展水电,加快页岩气等新清洁能源的开发等。我国节能减排目前是以各级政府推进为主导的模式,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要加快推动这种模式向市场力量推进的模式转变。在抑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严禁污染产业转入中西部地区的管控上,政府要更“有力”,同时通过将直接补贴转为间接性政策推动等办法,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让节能减排产业“有利”可图,推动企业参与其中,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为释放民企活力再加把劲

浙江省工商局发布的最新民企生存指数显示,2012年民营经济景气指数呈现明显U型的发展走势,前三季度连续下跌,四季度景气指数进入温和回升通道。

点评: 数据反映,民营企业已进入企稳向好的回升期。但也要认识到,目前民营企业从总体上看,在技术、品牌、渠道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相对落后。因此,释放民企活力要再加一把劲。在世界经济深刻而复杂的调整变化中,企业既要充分估计形势的严峻性及其不利影响,更要善于危中寻机、化危为机,在政府政策的鼓励和扶持下,及时抓住眼下欧美经济比较低迷、一些企业面临较大生存压力的契机,积极寻求对领先技术、知名品牌和市场渠道等多方面投资介入,充分利用全球科技智力资源,大力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力求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提高企业的国际市场拓展能力。令人欣喜的是,根据调查,目前民企最大的盼望是深化体制改革和优化创业创新环境,60%的民企对未来5年企业发展环境充满信心。

探索金融支持实业转型新路径

泉州继温州“珠三角”之后成为第三个金改试点,其重点在于探索金融扶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新路径。

点评: 最新公布的泉州金改方案提出,要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探索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新途径,建立健全服务实体经济的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这是泉州金改不同于温州和“珠三角”金改的特色之一。除此之外,针对当地金融业现状和发展“瓶颈”,泉州金改方案还提出了加大对小微企业及民生的金融支持力度、提升农村金融服务能力、规范发展民间融资等业务,其中不乏“加快推进小微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推进科技金融合作”、“推动侨资支持金融发展”等带有鲜明区域特征的内容。中央领导同志强调,要加强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结合。泉州担当这一重任,将通过差异化试点为全国金融改革探索积累经验。

让农民多点财产性收入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三年超过城镇居民。但是政府着力增加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在农村居民收入中的占比不足8%,远低于城镇居民水平。

点评: 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重点是稳定家庭经营收入、促进工资性收入增长。与此同时,还要增加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在农村居民收入组成部分中,家庭经营收入目前仍是农村居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随着农民大量进入城镇务工,工资性收入比例逐年明显增加,且增速快于城镇居民的工资收入增长。虽然近10年转移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有所增加,但到2011年年末,7.1%的占比仍不高,同期城镇居民的转移性收入比重已经接近24%,二者的绝对额相差8倍。因此,让农民多点财产性、转移性收入在当前显得尤为迫切。

加快释放新一轮改革红利

吴锋

大勇气去打破长时间形成的部门、行业利益和固有格局。只有这样,才能在释放新一轮改革红利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激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蕴藏的巨大潜力。

譬如,城镇化这一最大内需潜力的释放要靠改革。从国际经验看,目前我国已跨入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这个时期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城镇化带动力强。按城镇化率每年1%增速测算,我国每年将有1000多万农村人口进城,进而带动1000多亿元的消费需求,而相应增加的投资需求会更多。但这仅是理论上的。现在我国城镇化率按户籍计算仅30%多,远未达到我们所说的50%的水平。这就意味城镇化的实际效果是打有折扣的。有“市”才有“城”,这个道理实实在在。让城镇化的潜力充分释放出来,需要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让进城的农民真正成为有消费能力的市民。只有这样,城镇化引发的投资和消费才能没有水分、不折不扣。

又如,资本潜力的释放也要靠改革。到2012年11月末,我国广义货币余额94.48万亿元,银行金融资产总量更大。这样大的资金量,周转速度却比较慢,原因在于金融体制改革滞后,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存在“梗阻”。只有通过改革金融体制,让金融回归常识或本原,把雄厚资金的活力激发出来,畅通各方融资渠道,才能让实体经济获得坚实金融支撑。我国先后设立浙江温州、广东珠江三角洲、福建泉州等3个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用意就在通过“侦察兵”、“先遣队”趟出一条有效释放资本潜力的“康庄大道”。

形势比人强,它会逼着改革走。尤其是在今天,我国包括人口、资源在内的诸多传统红利都在减弱。根据英国经济学者智库的数据,最近10多年来,我国劳动力成本增长近4倍。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成果也显示,劳动对GDP增长的贡献是逐步下降的。面对这种情况,加快释放新一轮改革红利,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新动力,更为重要。

加快释放新一轮改革红利,分清政府职能和市场功能的任务尤为紧迫。2012年底,继国家多次减少行政审批项目后,有关部委再次通知,自2013年1月1日起批量取消企业注册登记费、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费等多项费用。此番“撤费”虽数额不大,但却凸显了政府向市场“放权”的取向。凡市场能有效做好的就交由市场做,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这是发展市场经济须遵循的一条重要规律。当然,这决不意味政府作用可以忽视,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是改革红利释放不可或缺的另一面。前段时间的“速成鸡”事件就告诉我们,政府在市场监管上的“缺位”、社会管理上的“错位”,以及公共服务上“不到位”等问题,需引起高度重视,这些方面,政府职能不应弱化,而应加强。

我国经济形势的新变化新挑战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 祝宝良

前瞻

鉴于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的新变化、新挑战,预计2013年经济增长8%左右,通货膨胀基本温和,失业率基本稳定

我国经济增长从2012年9月起开始呈现出稳中缓升的态势,但国际经济低迷不振、国内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以及经济周期性减速问题相互交织,使经济运行中同样出现了一些突出问题。

当前经济形势的四大特征

2012年经济形势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经济增长稳中趋缓,缓中趋稳。到2012年第三季度,我国经济连续7个季度小幅回落,前3季度GDP增长7.7%,回落1.8个百分点。2012年1至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比上年同期下降4个百分点,其中8月份仅为8.9%,为2009年6月以来最低水平。从9月份起,我国经济增长开始呈现出稳中缓升的态势,工业生产速度逐月提高;就业形势稳定,2012年1至11月份,城镇新增就业超过1100万人,高于去年同期水平,失业率维持在4.1%左右的较低水平。

二是国内最终需求支撑作用增强。2012年1至11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0.7%,增幅同比放缓3.8个百分点,如果消除价格因素,实际投资量比去年同期有所提高。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22.8%,同比下降8.7个百分点;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先降后升增长13.9%,同比提高8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增长16.7%,降幅达

13.2个百分点。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速逐月加快,2012年1至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4.2%,比上年同期回落2.8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2%,增幅同比提高0.6个百分点。

三是进出口增速明显回落。2012年1至11月份,出口增长7.3%,进口增长4.1%,贸易顺差1995亿美元,增加44%。同时,企业库存大幅度下降。自2011年4季度以来,企业的产成品库存同比增速不断下滑,2012年1至10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资金占用同比增8.3%,低于当月工业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库存增量从2012年初的下降20%左右扩大到10月的下降60%左右。

四是从经济增长、就业和物价的关系看,我国失业率较低,物价降至温和水平,说明我国经济仍在合理区间内运行。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很大程度上是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减慢的结果,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正常现象。国内外的研究表明,由于我国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资源环境约束强化,资本边际收益降低,我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从过去平均10%左右降至目前的8%左右。工业品出厂价格下跌幅度较大,说明工业生产偏弱。这既与房地产投资减缓、企业库存周期性调整、出口下降导致工业生产下降较快有关,也与部分制造业产能过剩有关。

制约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

当前,国际经济低迷不振、国内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以及经济周期性减速问题相互交织,使经济运行中出现一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工业企业经营困难。2012年以来,劳动力成本和融资成本较高,环境保护压力加大,企业生产和经营成本上升。部分行业

面临“去库存化”和“去产能化”双重压力,进入前所未有的转型升级阵痛期。工业企业效益出现较大幅度下滑,2012年1至10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0.5%,增幅同比减缓25个百分点。部分企业出现亏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额同比增长60%多。

二是局部地区金融风险显现。企业经营困难使企业资金链比较紧张,商业银行出于对自身资产的担心,加大了向企业和地方政府催债强度,在一定程度上加剧社会资金链压力。企业在产能过剩背景下缺乏投资欲望,慎贷现象也较为普遍。

三是制造业缺乏新增长点。前几年,我国钢铁、有色、建材、化工、造船、光伏等产业投资增加较多,形成的产能已进入释放期。随着世界经济放缓和我国实施房地产调控,这些行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虽然高新技术产业和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增速有所加快,但总体上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尚无法替代传统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

适度增加财政政策力度

2013年,我国将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度加大财政政策力度,积极扩大国内需求,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加大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力度,着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按照这一政策取向,预计经济增长8%左右,通货膨胀基本温和,失业率基本稳定。

一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会稳中趋缓。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项目平均需要两年多时间,2012年年中以来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增长会持续到2014年。2011年5月份实施房地产限购和限贷政策以来,我国房屋新开工面积增速呈现大幅回落态势,土地购置面积也在下降,这预示着房地产投资将会继续减缓。部分企业为节能减排和

降低劳动力成本,会继续更新设备和用机器替代劳动力,一些企业也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产能,但制造业产能过剩和企业利润减少,会削弱企业投资能力,降低企业的投资意愿,制造业投资会稳中趋缓。

二是企业去库存阶段即将结束。随着企业大幅降价消减库存,企业逐渐消化了高价购进的原材料,加上近期国际石油、铁矿石、农产品等价格出现企稳回升态势,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环比开始稳定,企业去库存的速度减慢。随着企业消减库存速度减慢,工业生产增速将有所稳定。

三是消费增长相对稳定。消费是一种社会行为,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高收入阶层对低收入阶层的示范性更强,家庭消费决策往往参考其他同等收入家庭或高收入家庭的消费。因此,消费即受本期收入的影响,也受到以前消费水平的影响,当经济形势变化和收入变动时,家庭往往改变储蓄以维持消费的基本稳定。消费毕竟是消费者在某一价格水平下愿意能够购买的商品或劳务的数量,消费需求必须是既有购买欲望又有购买能力的有效需求。2012年居民收入增速明显超过GDP增速,为2013年的消费奠定了基础。

四是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总体上没有太大影响,2012年全年外贸顺差2000亿美元左右。世界经济略有起色,有利于我国出口增长和我国对外投资。但由于各国激烈争夺有限的国际市场,贸易保护主义严重,这又会限制我国的出口。国内产能过剩、生产成本上升等因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外资对中国的投资,可能会对加工贸易产生负面影响。与此同时,全球长期利率和流动性泛滥将导致资源价格走高,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人民币汇率面临升值压力。由于库存调整基本结束,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价格走高,我国进口会有所增加。

消费结构变化带来投资新机

巴曙松

扩大消费正在成为当前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方向之一,而消费结构的调整,也正在成为扩大消费进程中引人注目的新趋势。这种消费结构的调整无疑会给经济增长带来新动力,也给投资带来新的空间和机会。

当前,支持消费增长的一系列因素正在逐步显现其影响力。随着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的到来,受一系列旨在改善民生的户籍、养老、保障房等政策影响,劳动报酬率在GDP中的份额将开始回升,中低端劳动者相对较快的收入增长速度,加上消费杠杆的加大,以及消费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带来中长期的消费平稳增长。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实际上是从“投资驱动投资”逐渐向“消费驱动投资”转换。在这个转换过程中,消费结构将对投资产生巨大的影响,将带来消费水平的提升和新的投资机会,对投资、经济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加强。

一是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中低端消费持续增长的新空间。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大背景下,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中低端消费将成为亮点之一。一方面,人口结构的变

化,使得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上升;另一方面,以新生代为主体的农民工有着“半市民”的生活习性,消费倾向远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

二是服务消费在消费升级中凸显发展空间。2012年,我国的服务业就业人数首次超过第一产业人口,这从一个特定的侧面显现出中国服务业的重要影响力。未来受消费者收入上升与人口结构变化的双重推动,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居民,服务业消费在总消费里面的比重从趋势上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比如,文教娱乐、金融保险服务消费占比、居住服务占比、医疗保健消费占比都呈上升趋势。

三是商品消费附加价值增加伴随着商品功能的多样化。从消费的发展趋势看,随着消费的升级,商品消费附加价值逐步增加。在消费长周期的前期,许多商品消费“低价放量”;到了消费长周期的后期,随着商品拥有量渐趋饱和,而收入增长也支撑消费升级,消费体现出从量变到价变的转换。

新型城镇化重在提高质量

侯永志

2013年,提高城镇化质量将成为城镇化新的着力点。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这次会议明确提出城镇化的质量问题,这对于我国推进现代化建设意义深远。

当前,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发展还很不平衡,尤其是城乡差距量大面广,差距就是潜力,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过去30多年推进城镇化的速度比较快,城镇化率每年以近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在提高。近年来每年有1000多万人进城,这相当于世界上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人口,我国城镇化从规模上来讲是世界上罕见的。

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从土地资源看,大多数城市都偏重用地规模的外延扩张,出

现了“土地城镇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的现象,土地资源低效利用问题在一些城市普遍存在。与此同时,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也见证了在城市经济增长、消费水平提高和物质生活改善的同时,却伴随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设施短缺、住房紧张、服务滞后和城市内涝等诸多问题,严重影响了城市生活质量的提高。

需要注意的是,城镇化推进的速度一定要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及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增强相适应,这主要取决于政策的引导。因此,中央强调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

与此同时,提高城镇化的质量还要想方设法创造就业机会,创造高质量的就业机会。要考虑到既能吸纳人口就业,又能使人们的收入提高;还要考虑到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和公共服务能力的提高。这既考验地方的政策设计能力、执行能力,又考验地方的经济实力。

